

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创新 科学应对新挑战

林毅夫

理论影响的一些拉丁美洲、南亚、非洲国家,虽然其工业建设取得一定成绩,但人民生活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仍然面临经济发展停滞和各种危机。包括中国在内的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面临经济发展速度不快、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问题。东亚少数经济体却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开始,以出口导向的方式发展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然而,这种发展战略从当时主流的结构主义理论来看是错误的。1978年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拉丁美洲、南亚、非洲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也相继从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于是,“转型”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个新潮流。事实证明,转型的指导思想不同,方式不同,其结果天差地别。

腐败、贫富差距等问题非常严重。其他少数几个在转型中维持稳定并取得发展的国家,同样是推行这种渐进的转型。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为何在发展中国家屡屡失败

中国与绝大多数其他转型国家经济发展成就的巨大反差,让经济学家不得不认真思考:理论的作用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看起来逻辑清晰,用起来却屡屡失败?

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理论来自发达国家,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例如,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通常是劳动力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的,生产力水平较低;发达国家的产业则主要是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产业,生产力水平较高。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性是内生的,是二者比较优势不同造成的——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

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一国若着力发展本身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其结果必然是企业缺乏竞争力,离不开政府保护和补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西方主流发展理论对此缺乏充分认知,导致结构主义理论给出的发展重工业的建议如同拔苗助长。新自由主义则忽视了原来所存在的扭曲是内生于维护不符合比较优势产业的需要,所主张的全面消除政府干预,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改革的休克疗法也必然惨遭失败。因为一旦“三化”同步实行,原来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国有企业就无法在市场上生存,大量企业因此破产,大量工人会失业,造成社会不稳定和政治不稳定,经济崩溃也就难以避免。

上世纪90年代,笔者就曾和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有过争论。当时一些人的看法是,国有企业之所以效率低,国家会给予补贴,是因为企业是国有的,因此,国有企业要进行私有化改革,取消补贴,提高效率。其实不然,许多大型国有企业承担着维护国防安全、保障国计民生等重大责任,私有化只会带来更高的补贴。因为私有化以后,企业会以同样的理由向国家要求保护、要补贴。当时这种看法只是理论推论,如今已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得到大量事实证明。

相比之下,在中国推行的渐进式改革中,由于对原来缺乏比较优势、缺乏竞争力的企业继续给予转型期的保护补贴,所以维持了经济与社会大局稳定。同时,政府对于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开准入,还积极因势利导,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随着资本快速积累,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具备了比较优势,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也逐渐减少,为进一步消除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创造了必要条件。

很多西方经济学理论讲起来头头是道,但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践却屡屡失败,类似的情况并不鲜见。例如,金融对现代经济运行至关重要,但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里讨论的金融制度安排一

般只对发达国家适用,比如大银行、风险资本、公司债等适合于发达国家资本密集、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大量资金、资本投入风险较大的情况。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绝大多数生产活动中集中在中小微企业和农户,需要的资本规模非常小,风险也主要集中在经营者的能力和信用上。如果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主张去做,引进大银行、风险资本、公司债等,就会造成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不匹配,导致金融没有办法服务实体经济。

关键在于实事求是 是进行理论创新

回溯7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各国经济发展实践中的应用,不难发现,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把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作为外生给定的最优结构,忽视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经济结构差异的内生性。若将其主张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实践,就会遭遇“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实行的结果事与愿违。

经济学理论要在发展中国家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就要推进理论创新,以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差异。新的理论只能来自于新的实践,中国过去70年的发展实践就是推进理论创新的金矿。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程度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并没有多大差异,但在40多年改革开放中,中国探索出了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发育奇迹。

所谓奇迹,就是不能有用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如果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中国,到处是问题,只要中国经济增长稍微放慢一点,国际学界和舆论界就会出现“中国崩溃论”。但实际上,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崩溃,还一直保持稳定快速发展,而且也不曾出现过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显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育奇迹非常值得我们去探寻其中蕴藏的新道理。正如习近平同志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把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经验作为理论创新的来源,最重要的是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性在哪里,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同时,也要了解这些内生差异性对经济运行、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影响是什么?这种思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等研究范式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上的运用。作为经济学家,应当知道,理论创新只有把握住一种现象的内生性,才能帮助人们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个目标的统一。

今后,中国的发展还会遇到像中美经贸摩擦、技术革命、金融风险、国际格局不确定性等新的挑战。但不管面对什么挑战,我们都不能盲目崇拜西方理论,而是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观察和分析新现象研究其背后的本质和逻辑,通过自主理论创新来指导实践、应对挑战。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慕德贵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媒体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加快推动媒体深度融合,进一步做大做强主流舆论,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习近平同志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当今时代,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只有因势而谋、顺势而为、顺势而为,才能占据战略主动。一是坚持筑牢思想根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学深悟透习近平同志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是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根本前提。我们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强化使命担当,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扎实开展动员部署、专题培训、考察学习、指导督促,解决认识模糊、目标不清、路径不明等问题。二是坚持目标倒逼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等不得、慢不得,只有主动作为,才能抢占先机,积蓄先发优势。我们强化目标倒逼,自我加压,全面启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推动媒体融合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三是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媒体融合发展是一场以技术创新为引领的媒体变革。我们充分运用贵州省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政策优势、技术力量、发展成果,推进全媒体时代媒体传播形式创新、手段创新、内容创新,努力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激发媒体发展活力,释放新闻生产力,实现宣传效果最大化、最优化。

全面形成高效联动推进的深度融合发展态势。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宣传管理部门要改革创新管理机制,配套落实政策措施,推动媒体融合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贵州省以重点推进省级、县级“两头”为牵引,指导带动市(州)级跟进,努力把握媒体融合发展的正确方向、总原则。出台机构编制、资源整合、经费补助、技术保障、队伍建设等系统配套支持政策,使媒体融合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二是突出重点突破这个重要方法。坚持聚焦重点、突出重点、以点带面,奏响媒体融合“大合唱”。重点推进省级新闻单位功能整合,加快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统筹带动市(州)融媒体中心建设,构筑省市县融媒体矩阵。三是突出示范带动这个有效抓手。积极鼓励先行先试、积累经验,立起标杆典型,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大力建设省级新型媒体集团,打造媒体深度融合创新示范基地、产业园、产业项目等标杆。精心打造中宣部县级融媒体中心示范点,集中选树一批省级示范点,推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整体工作。

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习近平同志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一体化发展的方向目标,盯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打造资源节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一是抓紧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聚焦实现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区域信息枢纽三大功能,打造一张网、一个机构、一键通、一个战略、一支队伍。二是抓好新型主流媒体建设。优化资源配置,整合打造省级大型媒体集团,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三是抓活现象级融媒体产品制作。推进内容生产改革,促进原创内容、权威报道、深度解读、言论评论等向新媒体延伸,使主流媒体“全起来”“快起来”“动起来”“火起来”。四是抓实技术平台支撑保障。立足贵州大数据先发优势,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提供基础性技术平台支撑。深入推进“智慧广电”先导工程建设,为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做强全媒体时代主流舆论。习近平同志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目的在于提升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保持定力,注重内容质量,改革创新内容生产传播机制,用正能量充沛的优质内容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紧扣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持续推出内容鲜活、形式新颖、感染力强的媒体重点报道,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成为响彻贵州大地的主旋律,使干部群众的思想更统一、精神更振奋、斗志更昂扬。二是开展融合立体传播。牢固树立互联网思维,强化用户意识,精准开展分众传播和互动化传播,不断增强主流媒体的黏性和吸引力。三是加强法治化规范化管理。始终坚持党管宣传、党管媒体,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管理,把导向要求和宣传纪律落实到各级各类传播平台,贯穿到新闻信息采集、发布、推送全过程。

(作者为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内容提要

回顾历史,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时屡屡失败。相比之下,中国探索出了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发展奇迹。面向未来,不管面对什么挑战,我们都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观察和分析新现象研究其背后的本质和逻辑,通过自主理论创新来指导实践、应对挑战。

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转型经验

怎样实现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是摆在当时很多发展中国家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在结构主义失败后,同样源于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成为国际主流思潮。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转型的。这一思潮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就必须一次性建立起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安排,包括价格市场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宏观稳定化。“三化”必须以休克疗法同时推进,如果只推进其一或其二,结果可能会更糟。根据新自由主义主张形成的改革方案,被称为“华盛顿共识”。众所周知,这种休克疗法给诸多国家甚至苏联那样的大国带来了巨大灾难。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转型并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而是在我们的领导下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推行渐进式改革。这种转型方式一方面给原来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期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了劳动力密集型的准入,培育和开辟了市场。我们还设立了经济特区、出口加工区等,在破解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瓶颈”的同时,有效降低新生的民营企业的交易成本,使其蓬勃成长起来。

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像中国这种既有市场调节又有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渐进双轨制是最糟糕的,甚至比原来的计划经济还差。因为计划和市场并存,政府干预的计划价格比较低,市场价格比较高,就会产生套利空间,衍生出腐败和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坚决不认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中国崩溃论”不时甚嚣尘上。但是,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发展。随着资本不断积累,中国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具有比较优势,取消补贴水到渠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最终并轨。

事实证明,中国采取的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不仅快速发展,而且成为同期世界上唯一没有发生经济金融危机的国家。而那些根据“华盛顿共识”来推进经济转型的经济体,绝大多数都出现了经济崩溃、停滞、危机,而且

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艰难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开始追求现代化。因应这个需要,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出了一个子学科——发展经济学。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理论又被称为结构主义,它主张发展中国家实现民富国强就要发展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现代化大工业。民富就是收入水平要跟发达国家一样高,那就必须有跟发达国家一样高的劳动生产率、一样先进的技术和产业;国强就要有先进产业和先进军事装备。因此,结构主义建议发展中国家要把发展现代化的先进产业作为目标。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通过市场发展起那些现代化产业,必须依靠政府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以进口替代的方式来推进。

虽然这种发展方式可以让发展中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现代化工业体系,甚至在部分领域取得了不起的成绩,但实行这种发展方式的国家,经济发展成绩并不好,尤其是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比如,受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

法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焕发光彩

步 超

人类法治文明的发展,同样不是只有一种模式。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华文化发展出“明德慎刑”“礼法合一”的中华法系,并在规范国家运行方面形成完备制度,蔚为大观的《唐六典》等历代王朝大典即是明证;古代地中海地区广泛的贸易活动,催生出商品交换规则十分发达尤以民法见长的罗马法。今天,法治已从传统和古典发展到现代,然而世界上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法治现代化道路,法治模式不可能定于一尊。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法律制度的生成和运作模式具有显著区别。人类法治文明并没有因走向现代化而失去丰富多彩、流于千篇一律,反而在体现世界性的同时保持本土性,呈现出一幅各具其美的图景。

就拿基本的司法制度来说,人类法治文明形成了不同的类型和模式。英美等国的法官可以找出若干年前的判例来确定某一行为是否违法,欧洲大陆的法官则主要依照体系庞大、逻辑严密的刑法典定

罪量刑。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国情特点、历史发展道路存在差异,究竟通过哪种途径来实现法治、法治的具体制度如何安排等,并没有统一的建构模式、实现机制和评价标准。可见,人类法治文明的发展虽有一定规律,但这些规律在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是多样的,这种多样性归根结底源于各国法治“土壤”的不同。不同的国情必然使不同国家走上各具特色的法治发展道路。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思想,所以中国人民追求大一统的政治发展格局,形成国家法制统一的文明传统。

法治文明要持续发展,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这既符合人类文明多样性这一客观现实,也是法治文明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通过照搬照抄别国的法治模式构建起自己的法治文明。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道路,是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践中走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民意愿。这一法治道路既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又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能够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具有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

中国在探索自己法治道路的同时,也为不同法治文明提供交流互鉴的平台。比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吸引众多国家参与,这些国家分属于不同法律体系。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努力促进不同法治文明交流合作,倡导各国共同为建立更加公平的多边合作机制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仅有信心对人类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也以实际行动促进人类法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焕发光彩。



中华文化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认为世间万事万物可以共生共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也曾说过,“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强调一般性和普遍性当中广泛且必然存在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东西方哲学同声相应,揭示出世界的多样性。

人类文明也不是只有一个色调、一种模式,可以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国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主张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

做好党建工作的有益参考 ——“新时代党的建设丛书”简评

黄宪起

党的十九大报告着眼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这个总要求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洪向华主编的“新时代党的建设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对党的建设进行全面阐述,政治站位高、思想理论性强,是适应新时代党建工作需要的研究成果。

该丛书共9册,分别从“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与党的建设”“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新时代党的思想建设与理论建设”“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新时代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与纪律建设”“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全面加强执政本领”为题,它们之间既相互独立、各自成书,又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共同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来展开。该丛书突出时代性和现实性,注重总结概括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鲜活经验,深入分析研究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此外,该丛书在每一章节后都专门介绍近年来各地在党的建设方面涌现的创新案例,增强了丛书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

新书评介